

颜色与中国古代文献分类

——以分类为中心看颜色在文献中的功用

周 亚

摘 要 在中国古代,颜色充当了一种文献分类的非常规手段。自先秦至清代,以颜色分类文献主要表现在以下领域:官方文书制作、图书出版领域、文献收藏领域、套色印刷领域。颜色在文献分类方面的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书”的区分、对“人”的区分、对“意”的象征;文献分类的层次包括基于文献单元的分类和基于知识单元的分类。古人以颜色分类文献,受到五色观与正色观念、等级秩序和礼仪制度、天人合一等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对图书排架、政治生活、语言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了文献事业与社会大环境的交互作用。参考文献 54。

关键词 古典文献 文献分类 文化史 颜色

分类号 G256

Color and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in Ancient China: The Classification-centered Functions of Color in Document

Zhou Ya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color was an uncommon means of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From pre-Qin period to Qing Dynasty, classifying documents with color mainly existed in the following fields: official document, book publishing,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chromatography printing, etc. The functions of color in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include: distinguishing “books”, distinguishing “people”, and symbolizing “meanings”; and the levels of classifying based on color consist of documentary units level and knowledge units level. Classifying documents by color in ancient China was influenced by related factors, such as the concept of five-colors and orthodox-colors, hierarchical order and ritual system, the theory that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and so on; it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olor code used in libraries, political life and Chinese language culture. In a word, documents and the society are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54 refs.

KEY WORDS Classical document.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Culture history. Color.

1 引言

颜色因其能给人以视觉上的分辨作用而具有了分类的功能,“角色”、“音色”、“成色”等都有表示类别的含义在内。同时,它也成为文献分类的手段,施之于文献的颜色本身也被赋予更多的社会意

义。其实,在中国古代文献史上,就有这种以颜色分类文献的现象,其背后又蕴含着不同的意义。通过查阅文献,笔者发现,相关论著^{[1]180-198,[2-3]}提到用颜色类分文献的史实,如隋炀帝时书分三品,唐朝集贤院区分藏书卷轴色彩,清代四库全书以四季颜色区分经史子集等。然而,对于颜色与中国古代文献分类这一问题,笔者尚未发现专门集中的

研究。

本文以前人相关论述为起点,结合图书馆学、文献学、政治史、文化史等知识,以文献考证法为主,分以下方面进行研究:第一,搜集并总结中国古代以颜色来分类文献(以图书为主,兼及其他文献)的种种史实(颜色在其中要能起着分类和标识的作用;由于颜色必然要依附于物质,因此也着眼于文献制作或装帧的材料,如卷轴装的轴、带、签),并对颜色在文献分类中的作用进行理论总结,包括具体功能、分类层次等方面。第二,尝试对颜色与文献分类背后的因素进行阐释,例如政治因素、社会观念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第三,分析古代以颜色分类文献对于后世的影响。本研究旨在以颜色与古代文献分类为例,阐释文献事业发展与社会大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2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

颜色很早就参与到文献制作与管理当中。商周甲骨文时期,“有些在刻字处填上朱砂,以增加美观”^[4]。不过,此时尚不能说明颜色起到了分类的作用。竹简和木牍是纸发明以前的主要书写材料,竹简常以不同颜色的绳子编联。晋太康二年,汲县不准盗魏王墓,发现大量战国竹简,即历史上的“汲冢书”。荀勖在《穆天子传》序文中称,“皆竹简素丝编……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按:即《竹书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5]又据《南齐书》载,“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王)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6]可见,战国时期古人已经有意识地用不同颜色的丝绳来区分图书。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讎国家藏书,编联竹简的丝绳就有“素丝”、“青丝”、“缥丝”(笔者按:缥为浅青色,蓝色,或月白色,三者接近)等的区别^{[7]118-119}。刘向等人在校勘完《孙子》以后书写定本时,“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8];“刘歆《七略》曰:《尚书》有青丝编目录”^{[9]1749}。汉代简牍文书

也会使用书囊封装,“其形制之大要为两段俱方底,其中约署施检而以白书绳缠之”^[10],不同文书所用书囊颜色不一,急件用赤白色,如“适见驿马持赤白囊,边郡发犇命书驰来”^{[11]2353};汉代诏书封囊用绿色,如“中黄田客持诏记,盛绿绋方底,封御史中丞印”^{[11]2935};涉及机密的大臣章奏用黑色,如“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12]。此外,李零^{[7]149}认为,黑色也是通用的函牍封囊颜色。这种以颜色区分文函的例子在后世屡见不鲜。

汉代出现纸张以后,极大地促进了知识传播和信息交流。在古代相当长的时间内,黄纸书写极为盛行。黄纸多是经过“染潢”(按:这一技术起源很早,《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有介绍)加工的纸。“古人对纸张染潢所用的染料主要是黄蘗,也称作黄柏。”^{[13]41}东晋末叶,桓玄下诏“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14],这促进了黄纸在书写领域的统治地位。汉代也有以“黄书”命名的图书,例如“东汉张陵传授房中仪轨的书就是以‘黄书’为名”^{[7]129}。在汉以后很长时间内,黄纸广泛应用于宫中、官府、民间和宗教机构的图书,书用黄色尚未成为区分和暗示文献收藏者身份等级的标识特征。不过,丁春梅认为,晋朝时,黄纸与白纸这两种上奏公文用纸已经开始显示出身份等级的不同^[15]。

西晋时期,荀勖负责整理国家藏书,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素素。”^{[16]3}“细素”为淡黄色,“缥囊”为淡青色,这不仅说明了黄色材料在西晋官方藏书中用于书写之普遍,同时说明此时青色与文献关系之密切。《隋书·牛弘传》记载:“刘裕平姚(泓),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17]可知后秦姚泓所藏图书皆用青纸书写。同时,晋代诏书亦用青色,如“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黄门令董猛以太子书及青纸诏曰:‘通书如此,今赐死’。”^{[18]1459-1460}又如“玮临死,出其怀中青纸诏,流涕以示监刑尚书刘颂。”^{[18]1597}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和权贵们在文献制作和收藏方面对青色的偏好在唐朝以后有所改变(尤其是官方文书领域)。

3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图书以卷轴装为主,“亦即在该时期这种卷轴制度发育最为成熟”^{[1]180};叶德辉也称:“隋唐间简册已亡,存者止卷轴,故一书又谓之几轴。”^[19]除了帛、纸等书写材料外,卷轴装图书的物理结构一般还包括轴、带(用于捆系)、签(亦称牙签),轴带签为用颜色分类图书提供了施予的载体。

隋朝时期,以卷轴的颜色和材质来区分藏书的等级和部类。《隋书·经籍志》在条理隋朝藏书史实时称:“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紺琉璃轴,下品漆轴。”^{[16]5}这与简牍图书时期,书以“素丝”、“缥丝”、“青丝”不同颜色丝绳编联的情况非常相似。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红色在隋朝宫内受尊崇的程度。此外,上文提到姚泓时期藏书皆“赤轴青纸”,可见这种红色卷轴是有历史传统的。与隋朝相比,唐代在这方面更进一步。《唐六典》记载:“集贤所写皆御书也,书有四部:一曰甲为经,二曰乙为史,三曰丙为子,四曰丁为集,故分为四库,……皆以益州麻纸书写,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靑牙轴绿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20]1459-1460}又《新唐书》:“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21]可见,唐代集贤院藏书以轴、带、签以及帙(装书的布帛封套)的不同颜色来区分藏书,不仅是对内容的区分(经、史、子、集),而且包含等级秩序之分(经库书用黄带,经史书轴用白和靑等正色,便可能包含这样的意味)。此时,“唐代四库书以图书自身装潢来区别其类的方法,达到了古代卷轴时代图书度藏制度之高峰”^{[1]198}。同时可以看到,红色、紫色、朱色作为分类标识在唐代官方藏书中也颇受青睐。唐朝时,除了藏书,受红色或相近颜色(如紫色)影响较大的文献类别还有书画,紫色成了官府书画装裱的惯用颜色:“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一例用白檀身,紫檀首,紫罗标织成带,以为官画之標。”^[22]

以上都是内府藏书以颜色分类文献的案例,此外,私家藏书中也有这种情况。邨侯李泌便是一例。李泌,字长源,历仕玄、肃、代、德宗四朝,曾任集贤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官至宰相,封邨侯^[23]。家富藏书,据称有三万卷:“邨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皆牙签,新若手未触。”^[24]可知其书为卷轴装,带有牙签。明《山堂肆考》记载:“唐李邨侯起书楼,积书三万余卷,经用红牙签,史用绿牙签,子用靑牙签,集用白牙签。”^[25]以牙签不同颜色区分经史子集,这不仅与唐集贤院藏书分类方法相同,并且四部所对应牙签的颜色也是一样的(均分别为红、绿、靑、白)。李泌有在集贤崇文馆修国史的经历,可能受其藏书管理方法的影响。

不仅在藏书方面,在官方文献制作方面,唐代也突出了颜色的分类作用,不同文书有材质和颜色之别。据《文房四谱》记载,唐代时,诏书改变用靑色的惯例,而用黄纸,“贞观中,始用黄纸写敕制”^{[26]51},并在宋以后成为定制。据唐李肇《翰林志》记载:

元和初,置书诏印,学士院主之,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命将,曰制,并用白麻纸,不用印。……凡赐与征召、宣索处分,曰诏,用白藤纸;凡慰军旅,用黄麻纸,并用印。……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靑藤纸、朱字,谓之靑词。凡诸陵荐告上表、内道观叹道文,并用白麻纸。杂词、祭文、禁军号、并进本。

凡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纸,所司印。凡吐蕃赞普书及别录,用金花五色绫纸,上白檀香木真珠瑟瑟,钿函银鏤。回纥可汗、新罗、渤海王书及别录,并用金花五色绫纸,次白檀香木、瑟瑟、钿函银鏤。诸蕃军长、吐蕃宰相、回纥内外宰相、摩尼已下书及别录,并用五色麻纸,紫檀木,钿函银鏤,并不用印。南诏及大将军清平官书,用黄麻纸,出付中书,奉行却,送院封函,与回纥同。^[27]

由此可知,唐代官方公文和军事命令类的文件以黄色和白色纸为主,道教相关用纸是靑色,而涉及周边国家外交事务的文书则用五色。黄、白、靑在古代被视为正色,适于大唐内部高层次的官方政令与庄严的宗教事务;五色杂彩的纸张用于外交文

书,并加以精致的包装,显得名贵华丽。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文书虽用同样的颜色,也可能因材料不同而有等级的分别,可参见《唐六典》关于中书制诏黄纸的规定^{[20]273-278}。

4 宋元明清时期

卷轴装是隋唐时期图书装帧的主要形式,而宋代以后,册页装则成为图书装帧的主流。因此,宋元明清时期颜色的分类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文献内容用纸、外表装帧或收藏管理所采用的材质及其颜色上。

上文提到,汉代以后的很长历史时期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黄纸的使用都非常普遍。宋代时,“高帝上元二年诏曰:‘诏敕施行,既为永式,此用白纸,多有虫蠹,宜令今后尚书省颁下诸州并宜用黄纸。’”^{[26]51}皇帝发布的诏书、浩令等都使用黄色^[28],宗教文献,也多用黄色。至于民间文献,则不敢用黄色纸张,而多用白纸。根据宋祁记载:

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颜之推曰:“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雌黄与纸色类,故用之以灭误。今人用白纸,而好事者多用雌黄灭误,殊不相类。道佛二家写书,犹用黄纸。《齐民要术》有治雌黄法,或曰:“古人何须用黄纸?”曰:“蕤染之,可用辟蟪。”今台家诏敕用黄,故私家避不敢用。^[29]

由此可称,在宋朝的文献领域,黄色已经具有分类的作用。不过,这种分类不是对于文献知识内容的区分,也不是对文献本身的高下之分,而更多的是对于文献制作和收藏者身份的区分和暗示,它所体现的是特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或庄严、光明、正大、神明的宗教色彩。

在宋代图书出版和收藏领域,官方藏书多黄本:“秘阁初为太宗藏书之府,并以黄绫装潢,号曰太清本。”^{[30]301}《崇文总目》编纂时,“先用黄纸书一本充秘阁收藏”^[31];又如,“庚辰,诏:‘诸军应有刻板书籍,并用黄纸印一帙送秘书省’。”^{[30]689}在宫廷以外的民间,除了多以白纸印刷图书以外,在藏书装帧和管理方面,多根据个人爱好选择包装的颜色

或材质。如宋初藏书家江正书皮多为青色,“书多用由拳纸,方册如笏头,青缣为褭。”^[32]又如王洙以白色绢包装“镇库书”,“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已不得见也。镇库书不能尽有,才五千余卷。”^{[33]18}再如,贾似道用金色题签装帧图书,“以抚州草钞纸、油烟墨印造,其装池至以泥金为签。”^{[33]70}

据史料记载,元代时以不同颜色来区分不同等级官员的封赏文书:“元之宣敕皆用纸,一品至五品为宣,色以白,六品至九品为敕,色以赤。”^[34]这种以颜色区分文书的方式,与古代官员穿着不同颜色和图案的官服制度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古代等级制度的外化形式。元代时,套色印刷有了新的发展。元代以前,便有套色写书的做法,如唐代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条例》中说:“先儒旧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经由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混而音之,寻讨未易;今以墨书经本,朱字辨注,用相分别,使较然可求。”^[35]李致忠说,元朝时套色印刷最主要的标志便是图书采用朱墨套印,代表作品便是至元六年朱墨套印的《金刚经注》,经文用红色,注文用黑色。而到了明代,套印技术更有发展,并出现“短版”和“拱花”等彩色套印技术^{[13]363-365}。套色印刷或者用不同颜色区分经文和注文,或者区分不同人的批注,或者区分一幅画中的不同内容;颜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即作为一种标识来实现对文献内容的区分。

明代时,经厂是重要的宫廷刻书机构。到了明代后期,经厂图书及刻板散民间较多,据刘若愚称:“自神庙静摄年久,讲幄尘封,右文不终,官如传舍,遂多被匠夫厨役,偷出货卖。柘黄之帙,公然罗列于市肆中,而有宝图书,再无人敢诘其来自何处者。”^[36]由“诘其来自何处”可知,明代大部分时候图书用黄色仍属宫内(及佛道)权力,民间一般不敢轻易僭越。

清代时,黄色具有极强的特权色彩。“黄色成为皇帝的专用色,……诏书只能使用硬黄纸”^{[15]44},而且,玉牒(皇族族谱)的颜色也不一样:“《玉牒》封面分为黄、红两种颜色,黄封皮为‘宗室玉牒’。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父亲显祖塔克世的子孙;红封

皮为‘觉罗玉牒’，记载太祖努尔哈赤伯叔的子孙。”^[37]很明显，这种以颜色区分玉牒的方式是为了分清血缘的远近。可见，在封建王朝皇室内部，等级的区分非常普遍。

清代官方藏书中，用颜色分类图书最典型的做法要属《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封面用绢，色仿四季，乾隆皇帝曾赋诗曰：“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38]实际颜色与此稍有差别。据施廷镛《故宫图书记》（《图书馆学季刊》1925年第一期）称：“（《四库全书》）封面内均有缮校官姓名，黄签，书皮及带，均以色别。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而目录则用香色。”^[39]⁴⁵³同样，《四库全书荟要》也照此设计：“经绿色，春也；史红色，夏也；子月白色，秋也；集灰黑色，冬也。总目以香色”^[39]⁴⁵⁵何为香色？“古之东宫，皆服绛纱袍，盖次明黄一等。国初定制，皇太子朝衣服饰皆用香色，例禁庶人服用”^[40]，可知香色的地位之尊贵，用于《总目》以显示其对于四大部类的统摄地位。

清代宫廷藏书中，以颜色区分文献还见于天禄琳琅。天禄琳琅是昭仁殿善本书收藏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宫廷善本特藏书库”^[41]²⁵，其藏书早于《四库全书》的编修，“初乾隆九年（1744年），命内直诸臣检阅秘府藏书，择其善本，进程御览，于昭仁殿列架度置，赐名曰：‘天禄琳琅’。”^[42]¹²“其书亦以经、史、子、集为类，而每类之中，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各以时代为次。”^[42]¹²⁻¹³其中，不同时代的古籍采用不同材质和颜色的丝织品函装：“其宋、金板及影宋抄，皆函以锦，元板以蓝色绋，明版以褐色绋，用示差等。”^[42]¹¹锦是彩色，是亮色，而蓝色绋和褐色绋的颜色不如锦鲜亮，以体现出不同版本古籍的等级高下。“而嘉庆初年所集天禄继鉴之书，虽无文献说明外观装帧，从存世者观之，似乎是以不同颜色的丝绢制成书衣，以四部区分：经部为石青色，即所谓‘石青杭细面’；史部为浅蓝色或米色；子部为绿色，偶见明黄色；集部为绛红色。”^[41]⁴⁴这种以不同颜色书衣区分部类的做法与《四库全书》相似。

5 讨论与分析

5.1 史实的总结：颜色功能、层次与变化

综上所述，自先秦时期至于清代，中国古代以颜色分类文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官方文书制作；图书出版领域；文献收藏领域；套色印刷领域。这几个方面密不可分，之间的界限有时非常模糊。从藏书主体来看，这种以颜色分类文献的现象以官方藏书居多。无论是先秦时期简牍文书采取不同的颜色以指示其紧急程度，抑或是隋炀帝以三种颜色区分卷轴等级，还是以朱红二色区别图书正文与注释，或者采用套色印刷古籍插图……颜色在其中所起的基本作用都是一样的，即以颜色作为一种标识来实现对文献的分类。从这个角度来说，颜色是一种古代文献分类的非常规手段——之所以称其为“非常规”，主要是因为古人以这种方式来分类文献的情况并不十分普遍；而且，以颜色区分文献时并不能做到类例详尽、层层深入，在指示文献知识内容方面的作用相对常规的“六分法”、“四分法”而言比较有限，只能起到补充的作用。具体而言，在中国古代文献分类中，颜色的功能、分类文献的层次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使用也随着历史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趋势。

（1）颜色的功能（以分类为中心视角）：第一，审美功能。颜色为文献外观增添了美感，如商周甲骨刻字处填以朱砂、唐代以五色纸制作与吐蕃交往的文书。第二，实用功能。例如对文献实体的保护功用，这一点是使用特殊材料后附加产生的作用，而非颜色本身的作用，如黄纸经“染潢”以防虫蛀。以上两者是颜色使用的基本功能，不直接起到文献分类的作用，与颜色的可识别性一起奠定了颜色用于文献分类的基础。第三，区分文献内容和部类，这一点符合现代图书分类的基本原则，即以文献的内容属性为分类的主要标准。如刘向父子以不同颜色丝绳编联不同内容的竹简，又如唐代集贤院和邺侯李泌以轴、带、签的不同颜色区分经、史、子、集四部藏书，再如清乾隆时以不同颜色区分经、史、子、集四部及《总目》。第四，区分图书等级的高低。

例如隋炀帝时秘阁藏书以不同材质和颜色的卷轴将图书分为上、中、下三品,但由于资料所限,无从得知其等级划分的依据和标准;又如清天禄琳琅藏书以不同颜色的锦和绋区分宋版、元版和明版等不同朝代的古籍,这种对等级的区分则建立在图书产生时间的基础上。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颜色对图书部类的区分也常带有区分等级高低的意味。第五,通过规定不同文献的使用颜色,间接区分人的身份和地位,并成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一部分,体现着礼制层面的功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官方文书制作和官府藏书装帧方面。例如,历代诏书的颜色、大臣奏章的颜色,宋代普通民众不敢擅用黄纸,元代时以不同颜色来区分不同职位官员的封赏文书,明清以黄色纸张包装或印制宫廷藏书(常伴以华美的装饰),以及清代时《玉牒》以不同封面颜色区分皇族的亲疏关系……在这里,颜色更多的是对于文献制作和收藏者身份和地位的区分和提示,是权力的无声昭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宫廷中文献多用黄纸作图书封面,这一点是与黄色作为五色中的正色与古代五行说分不开的^{[13][42]}。第六,宗教象征意义。例如,佛教图书多用黄纸,象征着佛教的庄严、光明、正大、神明,以及唐代时道观仪式的荐告词文(所谓“青词”)多用青纸朱字,都有其宗教象征意义在内^[43]。总结来说,建立在审美和实用功能(包括颜色的可识别性)的基础上,颜色在文献分类方面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书”的区分(区分文献内容部类或等级高下);二是对“人”的区分(不同文献颜色代表不同权力与身份的人群,如普通民众、不同职位的大臣、不同亲疏的皇族,乃至皇帝);三是对“意”的象征(例如宗教象征意义)。并且,颜色在古代文献分类中,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2)颜色分类文献的层次:颜色在分类文献时,所达到的层次也是不一样的。具体而言,包括基于文献单元的分类和基于知识单元的分类,前者又可分为文献单元整体级层次、文献单元部分级层次。一份奏折、一卷竹简、一本《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古籍,都属于文献单元^[44]整体级层次(文献整体),而一本经书里的正文部分与注释部分则分别

属于文献单元的部分级层次(文献片段),二者都是基于文献单元层次的分类。基于知识单元的分类是指颜色已经可以区分文献知识单元,这一点可见于套色印刷,例如,将作为知识单元的一幅图分成不同的颜色单元。

(3)颜色使用的变化趋势:从先秦时期在甲骨刻字处填以朱砂,到简牍时期区分缥带颜色和材质,再到隋唐时期以颜色将书分为三品或四部,再到套色印写图书,再到清朝以四季分四部、以不同色分善本书版本,体现了古人在文献制作、出版、收藏和管理过程中,利用颜色来实现对文献的区别和分类(并增加了附加价值,如文献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乃至发展到今天图书馆大量采用色标来分类和排列图书。同时,从古到今,官方与民间文献主色调也发生了变化:官方文书从黄、青兼用到主用黄,再到当今官方文件用红(所谓“红头文件”);民间则从宋以前的多用黄色,到宋以后的以白色为主,并辅以其他色彩装帧。其间过程的演变,体现了黄色对于区分官方或民间文献功能的变化:附加在其上的等级色彩逐渐增强,到了清代达到顶峰。例如,清代以颜色分类文献的现象较多,这也与清代专制制度的高度成熟相契合;并在之后逐渐淡化黄色所蕴含的等级和特权色彩,而更多地取其审美方面的价值。

5.2 背后的因素:观念、政治与哲学

中国古代以颜色分类文献的背后,有社会观念、政治制度、传统哲学等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尤为明显:

(1)为了审美和便于查找的需要。审美是人类的天性,古人在文献制作和收藏中,有追求美观的心理。同时,利用颜色的识别性,也便于文献的管理和查找。这是古代文献出版、收藏时以不同颜色的缥带施之于卷轴或用不同书衣装帧图书的基本目的,在此不赘述。

(2)五色观与正色观念的影响。所谓五色,“谓青赤黄白黑,据五方也”^[45],同时,这五种颜色在古人眼中也属于所谓的“正色”;与之相对的是“间色”,即两种或两种以上正色混合而成的颜色,

《环济要略》称“间色有五,谓绀(按:相当于今日的绿色)、红(按:相当于今日的粉红)、缥(按:相当于今日的月白或浅青)、紫、流黄(按:相当于今日的褐黄)也。”^{[19]754}五色与五行密切关联,在汉代时形成了五行色彩学,为后世正式确立了正色与间色的基本范畴。^[46]在古人眼中,正色与间色有正面和反面、积极与消极、尊崇与低下之别。这种正色观在古代服饰(尤其是宫中衣冠和官服)中尤其明显,不容失范。例如朱熹在《诗集传》中评《诗经·绿衣》称:“间色贱而以为衣,正色贵而以为裹,言皆失其所也。”^[47]古代用于文献分类的颜色主要为古人眼中的正色,如白色(如汉代“素丝”)、青色(如晋朝诏书用青色和姚泓藏书“赤轴青纸”)、黑色(如汉代涉及机密的大臣奏章和元代套色印刷中的经书注文)、红色(如隋朝“红琉璃轴”和唐代“红牙签”,以及元代套色印刷中的经文)、黄色(如宋以后宫中用纸的主色调),这体现了色彩观念对于古代文献事业的影响。

(3)等级秩序和礼仪制度。即使在文献领域,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古代礼仪制度也渗透其中。不同内容的制造采用不同颜色的纸张,不同官员的封赏文书区分红白,经史子集不同部类也需“朱紫”以别,不同年代版本的古籍依不同色彩和材质的函套以分高下,宋以后民间不敢擅用黄色,这些都体现了政治和礼仪文化的影响,是等级制度的外化。因此,颜色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辨识文献制作或收藏主体身份的作用(如明清时的黄色)。在古代,颜色的象征意义和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王朝改移,所尚颜色亦变,“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48],而不同文献所用主色也可能因此改变(但并非绝对)。例如,唐代时前三品官员服色均为紫^[49],在唐代官方藏书中,紫色及其相近颜色也常作为文献的标识;又如,清代时香色地位尊贵,用于《四库总目》以统御四部。

(4)传统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五行说等。古人追求自然界与人世间的和谐统一,乾隆时以经史子集封面分别对应春夏秋冬颜色,是其典型体现。与此相关,清人张潮说:“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

集宜春,其机畅也。”^{[50]25}这是从阅读心理的角度与四季的对应,与《四库全书》的经、集二部有所出入,或可反映两种不同的认识倾向。但不论怎样,都可见古人在知识生产与阅读生活中自觉地寻求自身(及精神成果)与外界自然的契合。

(5)其他因素,如个人因素。私人藏书家在图书装帧和管理中选择不同的颜色区分自己的藏书,或者以特殊材质装饰自己的收藏,则多是出于个人爱好和财力,如唐代李泌以及明朝藩王藏书所使用的不同颜色。

5.3 影响:色标排架、政治和语言文化

古人以颜色来分类文献,除了对现代图书装帧设计具有明显影响以外(这一点不在此赘述),在文献分类尤其是现代图书馆运用色标管理图书方面、政治生活、语言文化等方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文献分类与图书管理,尤其是在色标排架方面:在现代图书馆中,尤其是在少儿图书领域,存在色标分类的做法(山东省图书馆、东莞图书馆等都在一定范围内采用这种方法),起着辅助揭示馆藏和引导读者的作用^[51-52]。作为文献分类的补充手段,色标被广泛应用于图书分类和排架。由于颜色的醒目和标识作用,图书馆以不同颜色的色标来区分不同部类的文献,有利于图书馆按照不同色标进行分类排架和整理乱架的图书,也有助于读者找到所需要的图书。现代图书馆运用色标管理图书的方法,与古代以颜色分类文献的做法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无论是简帛时期以不同颜色的丝带区分竹简,还是隋朝时期以不同颜色和材料的卷轴将图书分为上中下三品,或者是唐代以不同颜色和质地的“轴”、“带”、“签”将图书分为四部,或者是清代天禄琳琅以不同丝织品区分古籍的时代和版本,都对现代图书馆色标管理产生影响。在这里,竹简的丝绳、卷轴的牙签、册页装古籍的封面等都近似充当了色标的角色,只是由于历史因素和条件限制,古代尚未形成具有成熟范式的色标分类方法。

(2)在政治生活方面:在中国图书史上,曾一度(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革结束^[53])出现过各种以封面颜色命名的内部出版物,颜色也染上了阶级

性,如政治类的“灰皮书”(一些政治类图书也有用红、黄或白色)、文学类的“黄皮书”(后来改为白皮或灰皮)^[54],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图书的区分,更是对阅读权利的限制。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古代颜色不仅用以区分图书内容或部类,而且用来规定文献的等级秩序,并将权力人为地施加在文献领域——这在古代官方文书制作、内府藏书中都屡见不鲜。可见,我国在一段时期内大量出现“灰皮书”、“黄皮书”等书籍,限制了普通民众获取和阅读某些文献的权利,也就并不是那么突兀和难以理解了。

(3)在语言文化领域:当某种文献固定或按照惯例使用某种颜色时,这种习惯便很容易使物理属性的颜色增加了社会意义,从而成为一种象征的符号,如今日所称政府工作的“红头文件”、“白皮书”,科研报告的“蓝皮书”,以及某些“黄色书籍”,又如“青纸”(代诏书)、“黄卷”(代图书)、“丹青”(代绘画)、“青史”(代历史)、“雌黄”(代校勘)、“丹黄”(代图书)等。只不过这种指称更多地出于对文献内容的区分,而不再是对阅读权利的限制。

在这个过程中,“色彩转换成一种逻辑推理方式和思想认知图式,大千世界的五颜六色被赋予了特殊的涵义,并通过对物象的视觉认识,转换成一种对内视心像的文化反思。”^{[50]78}从而,丰富了社会语言词汇,丰富了中国文化内涵,一大批与文献颜色相关的词汇成了古人及当代人语言词汇的一部分。

6 结语

总之,颜色与中国古代文献分类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文献事业与政治、社会、文化大环境的交互影响。文献既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和丰富社会文化。本文是借鉴文化史、政治史、美术史的视野对古代文献史进行研究的一个尝试。在研究过程中,也引发了笔者对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例如古代书籍装帧的文化内涵,古代文献事业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深远影响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思考。

参考文献

- [1] 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Fu Xuancong, Xie Zhuohu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book collection[M]. Ningbo: Ningbo Press, 2001.)
- [2]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466.(Caozhi. Bibliographic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466.)
- [3] 杨永德.中国古代书籍装帧[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140.(Yang Yongde. Books' decoration in ancient China[M].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6: 140.)
- [4] 钱存训.书于竹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22.(Qian Cunxun.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M].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6: 22.)
- [5] (晋)郭璞注;洪颐煊校.穆天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1.((Jin) Annotated by Guo Pu; Collated by Hong Yixuan. Biography of King Mu[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1.)
- [6] (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398.((Liang) Xiao Zixian. History of South Qi Dynast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2: 398.)
- [7]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Li Ling. The bamboo books and silk books & academic development[M].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8]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M].北京:中国书店,1989:399.((Tang) Yu Shinan. Beitang Shuchao[M]. Beijing: China Bookstore, 1989: 399.)
- [9]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Liang) Compiled by Xiao Tong; (Tang) Annota-

- ted by Li Shan. Zhaoming Wenxuan[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6.)
- [10] 劳榦. 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居延汉简考证[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0; 7. (Lao Gan. Textual research of Juyan bamboo books of Han Dynasty[M].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n Academia Sinica, 1960; 7.)
- [11] (汉)班固著; (唐)颜师古注.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 ((Han)Written by Ban Gu;(Tang)Annotated by Yan Shigu. Book of Han[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
- [12] (汉)蔡邕. 独断[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5. ((Han)Cai Yong. Duduan[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5.)
- [13] 李致忠. 古书版本学概论[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0. (Li Zhizhong.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ic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M]. Beijing: Bibliography and Document Publishing House, 1990.)
- [14] (唐)徐坚. 初学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517. ((Tang)Xu Jian. Chu xue ji[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 517.)
- [15] 丁春梅. 中国古代公文用纸等级的主要标识[J]. 档案学通讯, 2004(2): 43-46. (Ding Chunmei. The Main identifications of official papers in ancient China[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04(2): 43-46.)
- [16] (唐)长孙无忌,等. 隋书经籍志[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Tang)Zhangsun Wuji, et al. Jingji Zhi (Treatise on the classics and Writing), History of the Sui Dynast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17] (唐)魏徵,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 1299. ((Tang)Wei Zheng, et al. History of Sui Dynast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3; 1299.)
- [18] (唐)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Tang)Fang Xuanling. History of Jin Dynast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 [19] (清)叶德辉. 书林清话[M]. 北京:中华书局, 1957; 13. ((Qing)Ye Dehui. Shu lin qing hua[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7; 13.)
- [20] (唐)李林甫,等. 撰;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M]. 北京:中华书局, 1992. ((Tang)Written by Li Linfu et al; Punctuated and collated by Chen Zhongfu. Six Codes in Tang Dynast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2.)
- [21] (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936. ((Song)Ouyang Xiu, Song Qi. New History of Tang Dynast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936.)
- [22] (唐)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08. ((Tang)Zhang Yanyuan. Notes on famous paintings in histor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108.)
- [23] (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3620-3622. ((Later Jin)Liu Xu, et al. Old History Tang Dynast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3620-3622.)
- [24] (唐)韩愈. 韩昌黎全集[M]. 北京:中国书店, 1991; 120. ((Tang)Han Yu. Complete works of Han Changli[M]. Beijing: China Bookstore, 1991; 120.)
- [25] (明)彭大翼. 山堂肆考(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428. ((Ming)Peng Dayi. Shan tang si kao: The third volume[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2; 428.)
- [26] (宋)苏易简. 文房四谱[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Song)Su Yijian. On 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27] 傅璇琮,施纯德. 翰学三书(一)[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2-3. (Fu Xuancong, Shi Chunde. Three books on Han Xue: The first volume[M].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03; 2-3.)
- [28] (宋)谢深甫. 庆元条法事类(续修四库全书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289. ((Song)Xie Shenfu. Qingyuan tiao fa shi lei (edition of Xu Xiu Si Ku Quan Shu)[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2; 289.)
- [29] (宋)宋祁. 宋景文公笔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2. ((Song)Song Qi. Notes of Song Qi[M]. Beijing: Zhonghua

- Book Company, 1985; 2.)
- [30] (清)毕沅. 续资治通鉴[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Qing)Bi Yuan. Xu Zi Zhi Tong Jian[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7.)
- [31] (清)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 1957; 2759. ((Qing)Xu Song. Song Hui Yao Ji Gao[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7; 2759.)
- [32] (宋)王明清. 挥麈录·后录[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111. ((Song)Wang Mingqing. Hui Zhu Lu·Hou Lu [M].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1; 111.)
- [33] (清)叶昌炽著;王欣夫补正;徐鹏辑. 藏书纪事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Qing)Written by Ye Chang-chi;Added and corrected by Wang Xinfu;Compiled by Xu Peng. Poems on book collections[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34] (明)叶子奇. 草木子[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62. ((Ming)Ye Ziqi. Cao mu zi[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9; 62.)
- [35] (唐)陆德明撰;黄焯断句. 经典释文[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1. ((Tang)Written by Lu Deming;Punctuated by Huang Zhuo. Ching-tien shih-wen[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1.)
- [36] (明)刘若愚. 酌中志[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55. ((Ming)Liu Ruoyu. Zhuo Zhongzhi[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155.)
- [37] 肖东发,朱赛虹,何东红. 中国官府藏书[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 170. (Xiao Dongfa, Zhu Saihong, He Donghong. Chinese official book collection[M].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ress, 2009; 170.)
- [38]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第八册)[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484. (Complete works of Qianlong's poems and essays; 8th volume[M].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3; 484.)
- [39] 转引自:李希泌,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Requoted from: Li Ximi, Zhang Jiaohua.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ancient book collection and modern libraries in China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 [40] (清)昭槁. 嘯亭杂续录[M].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7; 885 - 886. ((Qing)Zhao Lian. Xiao Ting Za Xu Lu[M]. Taipei:Wen Hai Publishing House, 1967; 885 - 886.)
- [41] 刘蔷. 天禄琳琅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Liu Qiang. Research of Tian Lu Lin Lang[M].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42] (清)于敏中,等. 天禄琳琅书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Qing)Yu Minzhong, et al. Bibliography of Tian Lu Lin Lang[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43] 张泽洪. 道教斋醮史上的青词[J]. 世界宗教研究, 2005(2): 113. (Zhang Zehong. Research on Qingci in the history of Taoist rites[J].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2005(2): 113.)
- [44] 王子舟.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120 - 124. (Wang Zizhou.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Wuhan: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0 - 124.)
- [45]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黄侃经义句读. 礼记·礼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431. ((Han)Annotated by Zheng Xuan;(Tang) Explained by Kong Yingda, et al;Punctuated by Huang Kan. Liji·Liyun[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0; 431.)
- [46] 周跃西. 略论五色审美观在汉代的发展[J]. 中原文物, 2003(5): 73 - 78. (Zhou Yuex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esthetic concept of five-colors in Han Dynasty[J].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2003(5): 73 - 78.)
- [47] (宋)朱熹. 诗集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6. ((Song)Zhu Xi. Collected annotations of the Book of Songs [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0; 16.)
- [48] (清)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1634. ((Qing)Zhang Tingyu, et al. History of Ming Dvnast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1634.)

“台湾云端书库”电子书借阅服务推出

2013年9月7日,台湾地区高雄市宣布与远流出版社合作推出“台湾云端书库”电子书借阅平台。该项服务参考“公共借阅权”概念,借阅方式采用计点方式,系统默认每人给10点,每借阅1本书扣1点,借期14天,到期后系统会自动归还,点数用完可持借阅证或身份证明文件向高雄市立图书馆各分馆申请核发。1年累计可申请60个点,即最多可借阅60本电子书,未使用完的点数当年作废。市民借阅电子书所需的费用由高雄市政府和“高雄市新图书馆百万藏书计划”募款支付。

(摘编自:http://www.ksml.edu.tw/informactions/News/news_01.aspx?code=0000000576)

-
- [49] 李晓华,刘宗彬. 中国古代的颜色文化[J].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3): 32. (Li Xiaohua, Liu Zongbin. Color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J]. Journal of Jinggangshan Normal College, 2004(3): 32.)
- [50] (清)张潮. 幽梦影[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Qing)Zhang Chao. You meng ying[M]. Zhengzhou: Central Plains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51] 张贺春. 关于开放书库色标管理的探索; 以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为例[J]. 企业文化, 2012(1): 106. (Zhang Hechun. On color-mark management of open stacks: Taking kids' club of Dongguan Library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Corporate Culture, 2012(1): 106.)
- [52] 王晋月. 现代图书管理中色标排架法的设计与实现[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2): 158-160. (Wang Jinyue.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shelving books by color-mark in modern libraries[J]. Shenzhe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011(2): 158-160.)
- [53] 沈展云. 灰皮书,黄皮书[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7: 1-22. (Shen Zhanyun. Gray-cover books and yellow-cover books[M]. Guangzhou: Flower City Press, 2007: 1-22.)
- [54] 胡洪侠,张清. 1978-2008私人阅读史[M]. 深圳: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09: 115. (Hu Hongxia, Zhang Qing. Personal reading history 1978-2008 [M]. Shenzhen: Shenzhen Newspaper Group Press, 2009: 115.)

周 亚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2012 级博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邮编: 100871。

(收稿日期: 2013-02-08; 修回日期: 2013-04-24)